

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

黄承海

——五十一中学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的点滴回忆——



1985年上海市第一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上，上海市政府首次任命十位中学名誉校长，我区的叶克平、赵宪初、李楚材分别任上海中学、南模中学、位育中学名誉校长。会后区领导会见三位名誉校长。



2005年朱家泽（前排左四）参加中五（2）部分师生聚会，作者（前排左二）。

今年是位育中学（当时的五十一中学）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毕业五十周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如今也将是古稀的老人了。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王楚顺、朱慈勉、应利谷、王立人、王凯、高言、邾伟海、冯蕴晟等同学精心筹划和组织），近日将举行为期两天的热烈而简朴的纪念活动，预计有近百位师生出席。我作为当时与同学们相处多年的教师，也兴奋不已！五十多年前，学校里的教育、教学活动，师生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常挥之不去。

(一)

我是1961年从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五十一中学当老师，第一年我担任高一、初三各两个班的化学课教学工作。次年的五、六月间，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朱家泽副校长找我谈话，下学年要我担当五年制中三（2）班的班主任和四个班级新开设的化学课教学工作，并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将连续带班到中五毕业。就这样，在进入五十一中学的第二年起，我就参加这届中学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工作。

这届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工作，始于1960年秋季，全市有十几所学校参加，徐汇区仅五十一中学一所。当时五十一中学的五年制试点班，初中招八个班级，是面向全区各小学招生的，生源是比较好的。初三毕业时，从八个班级中招收一百八十名左右的学生，升入本校中四年级，未升入中四的初三毕业生，分别被复旦附中、上中以及区内的南模、市二、南洋、徐汇、有关的中专学校录取。高中阶段分为中四、中五两个学年，也就是说，要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普通高中三年的课程。这是解放后普教系统所进行的一项很重要的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学校的高度重视，师生的共同努力，1965年毕业时，圆满完成教改试点任务，在社会上得到非常好的反响！

1963年秋天，由四个班级组成的中四年级诞生了，对这个特殊的中四年级，校领导予以高度关注，抽调了学校中最富有教学经验的各学科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任教，如朱启新、李莲宝、蒋文生、黄孟庄、钱松若、朱彭令、贺俊三等（中五时又充实调整了张加荃、戴筱尧、章寿朴等老教师）。另外选派几位进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如徐鞠令、殷蔚芷（教俄语，她俩从中一跟班到中五）、曾建中（数学）、白铃（语文）、潘益善（物理）、黄承海（化学，兼中四、中五年级组长）。他们都只有二十几岁（我的年龄最小），组成一个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充满朝气活力的年级组。在年级组内，老教师对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青年教师除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外，彼此也相互鼓励，团结友爱。朱家泽校长经常深入年级组，悉心指导工作，时常找我去汇报工作，帮我出了不少好的主意，重要的教学、教育安排都凝聚了他的一片心血。这次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在位育中学校园内，同学们集资为朱家泽老校长立了一个半身大理石塑像，上面镌刻了“师恩难忘”四个大字，表达了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全体同学深情厚谊。

(二)

在我任教的三年（中三至中五）中，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抓得紧、抓得实，有成效。经常请领导、知名人士、劳动模范做形势报告，进行革命传统和理想教育，记得先后请团市委副书记杜淑贞、蒋文焕，劳动模范三轮车工人程德旺来做报告，报告深入浅出，十分有感染力，很受学生欢迎。结合重要节日，举行校会和班级主题班会，以学生为主体，内容和形式生动活泼。每位任课教师都很有事业心，精心备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作业，注重提高课堂质量，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关心帮助不同类型的学生，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记得物理教研组长李莲宝老师在中四任教时，根据自己多年从教的体会，大胆向校领导建议，弃用通编教材，提出自己编写教学讲义的设想。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中四年级，他动手编写了讲义印发给学生，进行讲授。他的讲课严谨、缜密，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判断和解题能力的培养很有帮助（一年实践证明李老师编的这套讲义很有特色，有很高水平），给学生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该试点年级面对中三、中五初、高中两个毕业的重要阶段，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有序进行，从来没有突击加班加点和任意增加课业负担的现象。对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在课余则有各种活动兴趣小组，有班级理科的“每日一题”，文科的“练笔”，还有话剧队、合唱队、舞蹈队的排练演出活动。当年学生就排练演出过歌剧《江姐》，话剧《年轻的一代》，独幕剧《变色龙》等。学校排球运动更受学生喜爱，每班都有一、二个排球队，参加全校的排球联赛（分高、初中），年级里有近十位是校队队员。毕业时大多被复旦大学录取。著名话剧演员陈少泽（曾主演电影《保密局里的枪声》，九十年代任上海青年话剧团团团长）在中四、中五时既是校排球队主力，又是校话剧队成员，还担任中四、中五（3）班的班长，中五毕业时，以高分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原主任朱邦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习之余也喜爱体育活动，常打排球，也能代表班级参加比赛。在中四（2）班，王宗炎和潘光两位同学发起定期举办时事讲座的活动，由他们两人轮流主讲，每月一次，连暑假期间也不

中断。他俩选定主题后，自找资料，自拟讲话的提纲，讲座过程中大家畅所欲言充分交流，受到同学好评。潘光同学毕业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国际政治系，从此进入国际关系学科的殿堂。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取得卓著的成绩，先后担任上海社科院欧亚所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因他的出色贡献，多次受到嘉奖，2001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68岁的潘光至今还活跃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舞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缩短一年学制的特定条件下，按照当年的教学安排，在中四、中五时还组织学生下乡（马桥公社）参加各十天的三秋（秋割、秋收、秋种）、三夏劳动。废弃的饲养场、旧仓库都曾是我们的宿舍和食堂，每天的出工劳动，伙食安排（从去镇上买米、买菜到担柴烧饭做菜）、开展各种活动等都是班干部发挥主体骨干作用，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尽管不少同学的家庭条件优越，从小缺乏独立生活经验和工作能力，但在初次下乡劳动中勇于学习，自觉遵守纪律、相互照顾。生活艰苦又充满乐趣，还在劳动之余，排练文艺节目在生产队打谷场向农民演出。中五下学期，大概是六五年的三、四月，临毕业前，还组织学生去了吴泾化工厂参加短暂基建建厂劳动。我们住在厂外的农民家，大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小间内，睡地铺（泥地上铺一层稻草）。每天以班级为单位，集合好队伍，以整齐的步伐进出厂区（当时全国开展“学习解放军”的活动）。铲土、挖沟，搬运水泥、砖头、石块，打扫卫生等分配到到什么任务都干。劳动热情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尤其每天年级集中军训操练很精彩，工人师傅一旁看了交口称赞。

（三）

1965年中五毕业时，在那时有点“左”的时代背景下，（如招生录取时，强调阶级路线，比较注重家庭成分等）这个年级升学率极高，除少数几位学生因家庭原因未被大学录取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高考时，他们大都被重点大学录取。

（1）1965年的五、六月份，一次体育课上，俞肖邦同学（女，现名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市社联原副主席）练跳箱时，不慎受伤跌倒在地不能动弹。记得当时还是由我与一位男同学两人立即抬着担架在卫生室老师和许多同学的陪同下送到瑞金医院，拍片诊断为两腿骨折，立即住院治疗。此时正值紧张复习迎考，俞肖邦住院后，惊动了老师和全班同学，尤其是不少女同学，轮流去医院为住院的俞肖邦补习上课的内容，使她尽量跟上班级复习的进度。高考那天，她是两腿绑着石膏，拄着双拐去考场的。俞肖邦最后还是考出较高的分数，被著名的北大历史系录取；八十年代初考入华师大历史系研究生，后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在学术上很有造诣。

（2）当年全国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活动，对同学们的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在高考填写志愿时，许多同学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克服家庭的困难，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记得中五（1）班的金岑梅、罗达芸、俞玲莉三位女同学就以中国农业大学为第一志愿，决定将青春献给农业，三位也如愿被录取，愉快地前去报到，在年级中有很大反响。中五（2）班的章贻良、张崇信、张台铭、应利谷、

（1）班的吴昶等都以北京石油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为第一志愿，决心为祖国的石油、水利电力事业作贡献。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石油、水利电力战线，成为重要的技术专家。又如（1）班的王凯，（2）班的吴桂玲、钟元元、卢小明，（4）班的周汀兰等都以第一志愿录取在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2）班的三位女同学都选择了飞机制造专业，表现出他们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崇高胸怀和满腔热情。当年有许多部队的大学也招收很多名额，政审和成绩都要求很高，学校动员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去报考，极大多数也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如（1）班的钱凯、马立华（女）等成绩非常优秀被著名的“哈军工”录取，这届有十几位被哈军工，西安电讯、工程兵学院、四军大录取，以哈军工录取最多。

（3）1965年，我校同时存在高三和中五两个高中毕业班（各有四个班级），共有24名学生被清华大学第一志愿录取，其中五年制试点班录取18名，高三年级有6名录取。五十一中学是全市中学中被清华大学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之一，且有多名考生考分名列华东地区前茅，引起清华大学招生组的高度关注。正好在上海出差的何东昌同志（八十年代初曾任教育部长），特地来到五十一中学，与校领导座谈（部分教研组长、年级组长也参加，我作为中五年级组长也全程参加，并回答了他的提问），了解五年制情况及日常的教育、教学安排。听完朱家泽的汇报及大家的发言后，他很高兴，表示要派清华附中

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来交流学习，还对我校向清华大学输送那么多优秀学生表示感谢。

(四)

五十年来，我与这些同学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师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加深。我任教的几个班级的一些同学几乎每年都有接触联系，尤其是我当班主任的（2）班，三十多年来，每年都安排在春节期间以茶话会形式欢聚，从未间断，还邀请其他几位教师参加，朱家泽老校长也几乎年年赶来参加。在历次市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中，经常会碰到我当年的学生，如在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同时遇见吴启迪和俞新天，当时三人的合影尤为珍贵，我一直珍藏着。在区委、人大工作时，我多次邀请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俞新天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来区委学习中心组、区退休领导干部大会上做专题形势报告，每次他们有请必到。2003年我退休后，不少同学因此常来看望并关心我。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和周文等同学，得知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消息后，最早约定，安排半天时间来我家欢聚，向我表示良好的祝愿。2008年秋，有几位同学知道我快到七十岁时，联合三个班级部分同学为我举行祝寿活动，不少同学发来贺信和电子邮件致意。退休后，我多次去美国探亲，分别受到定居在美国多年的钱凯、杨维德、谢公元、张人德、全惟伦等热情周到的接待……

行文匆匆，难忘挂一漏万。为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我特地在国庆长假期间，任思绪飞扬，尽情回忆，激情澎湃。一来表达对同学们和老师们一片深情，二来缅怀已故世的朱家泽、徐鞠令、蒋衍等老师和英年早逝的几位同学。祝愿各位老师健康长寿！祝同学们家庭幸福！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让我们永远铭记当年五十一中学的师生情谊吧！

作者系原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年11月1日黄承海老师，潘益寿老师与回沪校友合影。

凯靖转位育校友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

祝你们校友聚会圆满成功，大家高兴！十分遗憾，我在九月四日已离美返沪，没法参加你们的聚会，分享你们的快乐。

看到校友聚会的通知书和与会的名单，很高兴，大都是认识的。宝琳老师近几年虽未曾见面，但我记得九五年，我率教育团来美访问时，在洛杉矶，您和史美晶、何祖明曾来宾馆看我。后来你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也相聚过几次。红宝老师、承熹老师我记在04、10年我两次来美时（在东部巴尔的摩）也多次电话联系过，红宝老师来沪探亲时也曾见过面，想必你们都好吧！很抱歉陈明赉老师我怎么没印象？我也向你致意问好！

从六一年至八四年的二十多年中，我在五十一中学从教期间，最熟悉的是65届高中（从中三到中五，我既是班主任又当年级组长，184位同学我都认识并叫得出姓名。其次熟悉的是67届和72届高中）。王家斌、宓哲新夫妇比较熟，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家斌还是田径好手，哲新脑后的长辫子是很有名的。前年在沪还碰过一次面。周家钧自六五年毕业后似未见过面，但你在学生时的形象我仍记得，是排球队员又是话剧队的骨干，在班级和年级中都很活跃，学习也很优秀。这一届的学生在我脑海中均留有很深的印象。

几十年来许多人一直保持联系（这次在旧金山也经常与他们联系）。当年的中五（2）班每年春节聚会已持续了近三十年。名单中见到徐钧德，我很高兴。记得六一年分配来五十一中学第一年，我教高一（当时高一四个班设在向阳小学），他在4班，他的理科成绩很好（当时还有王培之、任德铭、杨世元、徐乃庄、孙龙祥、刘祖根等都很优秀）。与他恐有五十年未谋面了。我也向你致意问好！六七届的宓哲新、史美晶、俞沐民、蒋青、薛嘉禾、谢宇新中就谢宇新尚未见过（你当年的模样我也有印象，可呼之欲出！）。这段时间内，还曾和周嘉瑜、吴本荣（67届高中）、杨维德、张人德、谢公元（65届）、孙雯（87届；徐鞠令老师的女儿）等通电话或邮件联系。其他的同学中李慕靖、吉力立、苏红军、黄士耀、瞿德霖、吴攸承等大都也认识（虽接触不多）。矫桂瑾、柯晓明是教工子弟我更有印象，记得04年我来美时，矫桂瑾还专门发来邮件致意，他写的纪念父亲的长文我还仔细拜读过。晓明的父亲是我二十多年的老领导老同事，很熟悉。这里我没有全部列举认识的学生名字，请原谅，只是表达对大家（包括其他各位校友）的思念之情和良好祝愿！

今年，我和爱人是第三次来美探亲，趁着我们夫妇俩尚健，向女儿提出去西部各处游览（前两次在东部），见见同学亲友的要求。这四个月中，在女儿女婿陪同下，两次去西雅图（五月底应邀去一位学生家小住五天，六月下旬则搭游轮去阿拉斯加七日游，还去了温哥华亲戚家并游览四天）；七月中旬搭华人旅游团去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及总统山等处七日游；八月中又搭团去优胜美地、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四日游。周末，则在旧金山周围景点游览。虽然我多次来美，但每次均有不同的感受，甚为愉快。

这四个月中，在西雅图与林臻（87届高中）、戴元炜（80届高中）、熊永健（79届高中，他趁出差机会从康州赶来会我）分别相聚。在黄石团途经雷诺时会见了67届高中的罗申逸（本邀我在八月下旬去他家住几天，但恰遇山区大火，只得作罢）。在湾区，两次应邀去凯靖（67届高中）家欢聚畅谈，他还陪同我们去海边和斯坦福大学参观游览。我们还多次与79届理科班朱泓会见，她是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在这里开中医诊所。我爱人六月下旬临出行前一周不慎闪腰行动不便，幸亏她细心用针灸推拿治疗，不久就痊愈，保证我们顺利外出游览。总之，在旧金山湾区的四个月过得很开心。

我今年已七十四足岁了，看到校友名单，才知道你们中间多数也过六十岁了，有的也已退休。时间过得真快啊！作为老人，我有几句话和大家交流。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善待自己、善待别人。以诚待人、助人为乐。开心过好每一天。二要坚持参加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爱护自己的身体，定期检查身体，不要大意！争取使自己的身体衰弱得慢一点！三要有一点兴趣爱好。旅游、打球、唱歌、跳舞、写字、画画、看书、读报、写作等等都可以，这样自己的生活不会枯燥、单调。四要有一些朋友。在家有老伴、有儿孙固然很好，可享天伦之乐，但有时也因各种原因并不一定是最融洽、最投机（

不知你们认可否？)。因此需要有一些(三、五个可以，最好七、八个)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能定期不定期聚会、聚餐、毫无拘束地聊天交流、沟通情况，也可一起外出旅游，争取做到能够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这样有时会为你(为他)排忧解难。

我的退休生活比较充实，每周有三次打网球(每次一至二个小时，球友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退休老人，也有好几个八十多岁的，球场气氛很轻松愉快)每周还有三至四次的半个小时以上的快走(在这里，我每天晚饭后坚持去小区的运动场快走三十分钟以上)。每月有三、四次与友人打桥牌(有时还举行比赛)。打网球可以增强体质，打桥牌可以锻炼思维能力。我订了不少书报杂志，我喜欢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电视剧不常看。每年经常与朋友们(有时十几个，最多一次近三十个)出去旅游，去江浙农村的农家乐。也常去境外，近五年内，除两次来美外，还先后去了越南、柬埔寨、新、马、泰、俄罗斯，搭游轮去韩国和日本，旅途都很愉快。我们不定期在外聚餐聊天(老同事和中学、大学的同学，AA制)。现在我的心脏、血脂都不错，血压很好(115/70)，体重保持在68公斤左右(退休前最重80公斤，是近五、六年减下来的)，唯空腹血糖在糖尿病指标上下浮动。退休后老同事、老同学及过去的学生常来我家探望闲聊。总之，我的退休生活颇为充实和愉快。

说这些话，无非是说明一点，要珍惜六十至八十岁的好时光，主动权可掌握在自己手里，争取过一个健康、平稳、幸福的晚年!(从钟声校刊看到许多校友如家斌、哲新等写的文章，知道他们的晚年生活很丰富充实幸福)祝福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幸福的家庭!

今年学校将举行七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欢迎各位来沪参加!

黄承海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于旧金山湾区女儿家

难忘的“位育”情结

黄承海老师

我从61年大学毕业到徐汇区工作，03年退休，前后整整42年，在五十一中学(今位育中学)工作了23年，从84年到03年在机关工作了19年，今天回想起在位育那段工作经历，是我的人生中受益匪浅，终身难忘的日子，位育的老领导、老同事、任教过的班级和同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报到

61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拿了师院毕业分配通知书到区政府集中，在机关巧遇同分在五十一中学的赵家镐(之前，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就一起乘42路前往五十一中学报到。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问了交岗的民警才找到学校大门。在校长室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朱家泽同志。他亲切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分别向我们介绍学校和教研组的情况，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我们，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锻炼，他说，学校今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教师身上。接着，就给我们明确新学年的教学任务，让我担任高一(高一年级当时还设在向阳小学)、中三各两个班的课，并当高一(4)的副班主任(班主任是沈文君老师)。

记得当年一共有十位新教师报到，他们分别是：顾蔚华(化学，她比我高一届，从第五师范调来)、徐鞠令(俄语，她从市二中学调来)，其他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有谷红宝(体育)、刘序常、金复华(语文)、廖志豪(历史)、潘益善(物理)、金艳清(生物)、赵家镐(数学)和我(化学)，为此学校的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三位校长和工会主席朱耀坤老师等，专门在红楼二楼的工会俱乐

部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困难时期，学校的食堂以一碗南瓜汤作为点心来招待我们，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但我们当时还是感到相当亲切、相当温暖的，我们为能成为这所学校教师集体中的一员，而由衷的喜悦。我还记得，开学后的第一次教工大会上，我作为新教师的代表发了言。

我很幸运，在位育中学，有机会参加五年制的试点工作。62-65年，从中三到中五，我担任了班主任和化学课的教学任务，中四、中五时还兼任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工作量比较足、任务比较重，但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在校领导的指导帮助下，在老教师的关心支持下，逐步适应并胜任各项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这一届五年制的试点工作圆满完成，得到社会、家长的一致好评。文革前的五年，组织上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年年使用新教材，任务虽艰巨，但使我较快地熟悉全部高、初中的教材和教法，打下了比较好的业务基础，初步学会班主任工作和年级组的管理工作。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最踏实、最有成效的五年。65年秋，送走了65届，我担任67届（3）班的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可惜因文革而中断了。在文革期间，我曾担任72届（2）的班主任，还兼年级组长（有十五个班级、八百多学生），当时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学生来源都比较差，但年级组的老师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心协力，在教育、教学工作上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任务，使我受到一种极不平常的磨炼和考验，对我工作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后，我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在学校主要领导张启昆和陈炜的带领和指点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工作上，经过学习和实践，使我不断进步成长。在位育中学，我前前后后工作了二十三年，我从青年走向了中年，留下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我对位育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崇敬的几位老领导

在位育任教的二十三年中，接触到的学校主要领导有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鲁夫、张华、张启昆、陈炜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领导水平、懂业务、会管理，都是我崇敬的好师长、好领导。

李楚材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前，他就在位育中学试行了中学五年一贯制的学制，到了六十年代初，又积极实施了新一轮的五年制试点，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可惜只完成了60-65的一届，后几届因文革而中断了），他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记得63年秋，在庆祝校庆二十周年的教工聚餐时（在老东楼底楼餐厅），借吃寿面（上面盖了二个荷包蛋）的机会，李校长即席向全体教师发表祝词，希望位育优秀传统代代（蛋）相传、绵绵（面）不断，令在座的全体教工难以忘怀。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教师，与李校长的接触交往不多。八十年代中期，在他被任命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后，因我在区里工作的关系，曾与他多次交往，时有电话联系，有几次应约上门去拜访他，听取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次在他家巧遇也去看望他的朱家泽同志，我正好随身带了一个相机，在我的建议下，为他们拍了好几张照片，他俩作为师生又是同事关系，单独在一起的合影可能仅此一次，事后他俩拿到照片后甚为高兴。此外，在八四年第一届教师节上，叶克平、李楚材、赵宪初被市政府分别任命为上海中学、位育中学、南模中学名誉校长时，我不仅参加了在展览中心宴会厅举行的仪式，还主动充当了一次“摄影记者”，抢拍到汪市长向李楚材等颁发任命书的珍贵镜头。事后，区委、区府也专门举行祝贺的仪式，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与李楚材三位名誉校长在一起的照片，每当手捧这张照片，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甚觉珍贵。

胡蔚英和鲁夫，他们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作为支部书记，他们是当年位育中学的主要负责人，我作为一个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在我的眼里，他俩是政治水平高，熟悉学校管理，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好领导，他们尊重教师的工作，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能组织好发挥好领导班子的作用，学校党支部是深受广大师生信赖的战斗集体，作为主要领导，他们还能和教师亲密相处，印象深的是，中午休息时，在工会俱乐部，他们还常常和教工一起下五子棋和打乒乓球，关系极为融洽。文革结束后，胡蔚英曾先后担任徐汇区的区长、政协主席。八四年三月，时任区长的胡蔚英同志曾陪同区委书记邢志康同志来学校找我谈话，要我作好去区里工作的思想准备。四月下旬，我接到调令去教卫部工作。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较多的接触，他在工作上给我很多的关心和指点。他离休后，仍一直关注着区的工作，对教育事业和位育中学的建设和发展，发表不少重要的意见，尤感亲切。鲁夫同志文革后调往

市二中学任书记兼校长，每当我去市二中学联系工作时，他都很亲切、很坦诚地与我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和鼓励。八十年代末，他离休后，曾应区委领导之邀，与朱家泽同志共同担任区教育咨询组负责人，经常带领一批资深的老领导，深入各类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我们很少见面，但每当位育中学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时，还经常提起他，大家很怀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领导。

朱家泽同志当年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五年制的试点工作，经常受到他的关心帮助，四十多年来，不论在位育中学还是区里共事期间，他是我接触最多、交往最深，对我教育最大的一位领导，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最真挚的朋友”。去年他不幸病故后，我立即以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他的文章，分别登载在《徐汇报》和区政协的有关材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有较多的回忆，这里不再重复，几年前也曾在位育海外校刊上登载）。

张华同志是在文革中特殊时期，来到位育中学担任主要领导的，我与他有一些接触和交往。他也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有文化素养。在那个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又十分无奈的年份，面对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小将”，他发挥了老干部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维护学校和教师良好的工作环境，他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多次在小范围内流露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忧和对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做法的不满，有时为了保护教师免遭打击甘愿受些委屈，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他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对他落实了政策，在区人大机关担任领导，离休后，身体不太好，我也曾多次去他家探望。

张启昆和陈炜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调来我校任主要领导的。当时的位育中学，原来的校领导有的调离，有的退休，记得在位的仅我一人（那年我任教导副主任，以后朱彭令、陈钧渊、叶宝康、张礼贤先后任教导副主任），那段时间，我在他俩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有较多的联系和交往，也有较深的情谊，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毫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沟通情况。他俩的政治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领导风格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那几年，是位育中学最艰难的时候，张启昆和陈炜同志带领大家，发奋努力、踏实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教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令全体教工无比激动和兴奋，他们两人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值得回忆的事很多，印象特别深的有：

(1) 在拨乱反正，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做了大量细致、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两位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对四人帮那套做法有切肤之痛的感受。来校后，通过个别谈心，召开各种教师座谈会，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勇于探索。他们两人还分别去一些老教师家里走访，予以关心和慰问，对家庭、本人存在的思想障碍和困难，态度很诚恳的听取和关注，并尽力解决。我就陪同陈炜同志去探望过张嘉荃老师。张老师在文革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迫害。那年，她近六十岁了，病休在家，原本想早点退休算了。陈炜同志去看望她时，很亲切地鼓励她养好身体，大胆出来工作，带教好青年教师，为振兴教育事业再作贡献。张老师听后深为感动，当场嬉问陈炜：你们再重用我，就不怕再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陈炜立即回答：今天来看望你，就表明校领导对你的信任和尊重，对你多年来工作的高度评价，我们再也不会知识分子政策上走歪路，你尽管放心！学校会全力关心和支持你的工作！这次家访后，张老师心情很舒畅，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本来体弱多病长期休息在家的她，很快就得到康复，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中去。她每天到校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做到热心、细心、耐心，经常到课堂听课，还具体辅导青年教师如何备课、如何命题，在她无微不至的关心下，一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或为学校的骨干，挑起了教学重担。有时学校师资紧张时（如79届理科班教师长病假），她还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代了一学期的课。从七九年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上。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张老师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都出奇的好，展现了一位老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类似张嘉荃那样的老教师，当时在校内是不少的。例如陈冰清老师，在应邀担任学校顾问的那几年，几乎全身心投入，全力支持张启昆、陈炜的工作，对当时学校的各项工作发表了许多很具体、很有成效的意见和建议，两位主要领导对他很信任、很尊重、很照顾，使他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工作能力，在他的晚年又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精神面貌是很振奋的，心情是十愉快的，在老教师中产生很大的反响！(2)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些教师先后出国探亲或定居，对此，两位领导以十分认真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记得杨宝琳等老师赴美定居手续办妥后，张启昆同志就找她谈心，勉励她出国后不忘祖国情怀，要多向学校介绍国外好的情况，常回国走走看看，老张还对杨老师说：你去美国，支部会热烈欢送你，将来你若想回来，我们同样会热烈欢迎你！过几天，杨宝琳老

师临行时，学校真的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令杨老师和到会的同志十分感动，生动体现了两位领导切实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真心实意！之后几年，每到春节，他代表学校，还专门发贺卡给在国外定居的各位老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支部主要领导，能这样做是很有胆量的，也是很不容易的（3）他们严以律己，不徇私情，以此带动和要求班子的成员。当时位育中学的招生情况已趋紧张，慕名而来的家长和学生应接不暇，张启昆在招生工作上严格把关，不随意开口子。记得有一次，上级部门曾派人来，希望照顾解决一位已故中央领导的孙子进位育就读，在班子开会讨论时，多数同志感到有点为难，如拒绝，似乎情理上有点讲不过去，但张启昆明确表态不同意随意开口子照顾，在场的同志看他讲得有理，态度又坚决，就不再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了。这在当时环境下，表明他的党性很强，令人敬佩！记得当时，两位领导还在班子中宣布一条规定：在评先进时，班子成员一律不参加，让给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教师，这在教师中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张启昆同志平时生活上艰苦朴素，他的双手和头部经常颤抖，吃饭写字都很困难，尤其在公众场合，更难控制。那几年，他在学校用步，从不让食堂照顾，买了饭菜带到办公室，用双手握住调羹慢慢进食，有时我们看到此情景，很难过也很感动！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严格要求班子成员，所以两位领导在学校威信高，有号召力和凝聚力。（4）大力培养和关心青年干部，当时在学校的领导层中，张和陈是年令比较大、经验丰富又有水平的老同志，他们两人合作配合得很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这些同志，大都缺乏学校领导的工作经验，只是在他们指点下，做些具体工作，对全局性工作很少关心。老张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身体欠佳，尤其是双手颤抖，不能书写，他每次去区里参加重要会议后，回到学校，马上找办公室同志（经常是叶秀珍老师）来，由他回忆复述会议内容，让叶老师记录成文，再向班子或全体教工传达。老陈在时，学校的重要计划、文件都由他执笔，老张最后审定。老陈调离后，开始一段时间，老张仍用老办法，先由他思考，准备好腹稿，然后由他口述，让办公室同志记录成文，交班子讨论定稿，那时学校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陈炜调离后，老张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先从制订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开始。在班子讨论后，他要我们轮流执笔，成文后，交给他审核，他提出意见后，再由我们修改、定稿，并负责在教师大会上宣讲布置工作。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对我们这几个人来讲，还是难度不小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提高的机会。记得还是从我（当时我已担任支委、副校长）开始实行这个办法的。另外，在开会讨论工作时，他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坦率地发表意见，讲错、讲不完整，他不会随意批评而是耐心分析指出，以此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和领导水平。所以，在这几年中，班子成员积极性高、思想活跃又步调一致，大家齐心协力，学校各项工作很有起色。（5）张、陈两位领导还在政治上关心和启发我。记得七八年底，张、陈两位领导分别找我谈心，重点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明确帮我分析，指出我的家庭情况不应该成为要求入党的障碍，要我解除顾虑，振奋精神，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党组织。春节过后，我重新写了一份入党报告并请陈炜和姜顺法两位同志作我的介绍人，七九年六月支部大会审批通过我的入党要求，我幸运地成为位育中学文革结束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同时还审批通过了孙欣耕同志的入党要求）。八三年后，陈炜、张启昆同志先后调离学校（朱彭令同志任支部副书记，之前，区里调来庄中文同志任副校长），陈炜曾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宣传部长、副区长（八七年后调任静安区区委书记、人大主任，九七年离休），老张则任区教育学院院长兼总支书记，还担任区人大副主任。八四年我调离学校后，在区里工作时，又与他们有较多的接触联系，从未间断。可以讲，这三十年来的进步，工作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两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的结果，几十年来我一直很敬重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几年，张启昆病危时，我多次去探望他，询问他有何最终的嘱托？。他虽然故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范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温馨、团结、奋发向上的教师集体

1，当年，我所在的化学教研组，都是女同志（张嘉荃、陈惠娟、顾蔚华、喻昌楣），我是新教师，又是年令最小（63、65年后，徐大年、周觉平分配来校，以后陆续又分配来了一些同志），所以各位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爱护，热情帮助。第一年我任教初三、高一两个年级时，陈惠娟、喻昌楣两位教师无论在教材分析、备课命题还是演示实验等环节上，都对我悉心指点，发现不足及时指出，有点进步就鼓励。记得上第一节时，教研组长张嘉荃老师约了陈惠娟和教导主任陈冰清老师来听课，听课中，除向我提出意见外，他们勉励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的场景似还浮现在眼前。二个月后，在教研组的安排和鼓励下，我在高一（1）班向全区化学老师开了一节公开课，为此教研组全体同志都来关心指导，尤其是与我同教材的喻昌楣老师更加热心。张嘉荃老师还特地请来了市教育局的季文德老师和已调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李玉廉老师（原教研组长）来听课指导。作为一个刚踏上岗位的新教师，这是很

大的鞭策和鼓励！平时，我们教研组学习空气很浓，组内相互间经常听课，交流心得体会，每天中午食堂用步时，总是坐在一起交流沟通，甚为亲切、融洽。教学上，很重视备课组活动，每堂课，从教材分析、演示实验到复习提问、作业布置，都要仔细讨论研究，统一认识。不论是谁，凡先上课的，在课后就会主动把课内的教学效果和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别人，以期共同提高。教研组还经常去外校先进教研组学习取经，学习有关报章杂志上介绍经验的文章，一些重要的教学实践活动，如大型公开课、化学实验考查等，全组通力合作，以期达到最好的成效。教研组内，不论是谁，也不论是那个年级，只要有人病假，总有人会主动出来代课。63年春天，我因劳累，一度发声嘶哑，无法上课，当时教高三的张嘉荃，教高二的顾蔚华与陈惠娟都争着来代课，一周的课就由组内同志分担，没放掉一节课。64年秋，我第一次教高中毕业班，教学上毫无经验，但张嘉荃老师鼓励我勇挑重担，她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向我传授，常让我随堂听她的课，在她的带教下，那届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任务较好地完成，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化学组的这种好风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教师，在校内有较大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我虽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但我仍在第一线兼课，连续六年任教高中毕业班的课。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是永远不会离开教研组的，与教研组教师深厚的情谊从没间断过。八四年我到区里工作，仍经常联系，还先后举行两次聚步联谊活动。现在原教研组的同志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了，但近期还时有联系，节假日我仍象以往那样去探望已九十高龄的张嘉荃老师。

在位育中学许多老教师都象化学组老师一样，对青年教师很热情、很关心。我第一年的办公室临时安置在北四楼，那里大都是数学组的老师，如叶宣薇、杨光明、陈文翰、蔡光天等人，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也经常在教学方法、学生工作上指点我，我一个人在这样的办公室并不感到孤独，却感受到长者对青年人亲切、温暖的情怀。六三年起，我先后担任过中四、中五的年级组长，这两个年级组，几乎集中了校内资深的教研组长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朱启新、李莲宝、章寿朴、张嘉荃、蒋文生、戴筱尧、黄孟庄等，他们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级组长，都很支持、很配合，热情诚恳地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丝毫没有轻视的情绪，这一点我是很感动的，是我当年做好工作的重要动力。

2，位育中学从60年起，从华师大、上师大陆续分配来二十多位青年教师，当时的学校支部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那几年，先后委派汪学瑜和白铃任团支部书记，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在青年教师中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学校由朱家泽联系和指导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当时的青年教师大都住在学校宿舍内，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的第一年就勇挑重担，如曹建中、赵家镐、邓大文就任教高三毕业班。在学校领导和老教师的关心帮助下，都很快地熟悉和适应所担负的工作，两年后，有的还担任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记得63年组建中四年级组时，组内除了一批资深的老教师外，班主任都是青年教师，有曹建中、徐鞠令、殷蔚芷、潘益善、白铃和我。我们几个班主任，在工作上相互鼓励和支持，在一些重要环节上，相互提醒和帮助，两年中，我们青年教师之间也好，青年教师与各位老教师也好，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整个年级组的工作很有生气、很有成效。63年秋、64年夏和64年秋，由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带领，整个年级先后去马桥农村和吴泾化工厂劳动，我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好评。六十年代初的几年，位育中学良好的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良好的政治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很快成为学校的骨干，涌现了一批师德好、业务强、有丰硕成果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有的走上学校和区的领导岗位。赵家镐、潘益善、蒋衍、陈文高、金荣熙等先后评为特级教师，张礼贤八三年调到区里工作，曾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区人大副主任。赵家镐在八十年代中期起，在担任位育中学校长的十多年中，位育中学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他多次荣获上海市和全国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被评为特级校长，后又命名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还先后当选为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是当年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今天，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在位育中学工作、生活的情景，多年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难忘和留恋。多数同志，至今仍有来往，还保持原有的老习惯，相互之间直唤名字，无话不谈，真诚相处，十分亲密。

3，位育中学的老师都是以事业为重，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对班主任工作积极负责，对学生一片真情又严格要求，许多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文革中学校的好传统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教师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炽热之心不变，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竭尽全力献身教育事业。这里记起两件事：（1）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后，招收了72届（按地段分配，就近入学，这个年级有十五个班级，八百

多名学生，我任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当时学校并没有那么多教室，年级组的老师人人动手想办法，与后勤人员一起挖潜力，把东楼底下的小食堂以及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都清理出来，把一间阴暗、潮湿的储藏室辟为年级组办公室。教师办公桌不够，好几位教师每天拎着包去图书馆办公。好几位教师因种种原因，只得临时改教其他课。如原上体育课的曾倩老师改教政治，学外语的肖子真老师临时改教语文课。当时年级没有开设化学课，我就改教了四年的政治课，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来对付。年级组内所有任课教师都当正副班主任，以应对混乱的学校秩序和各种干扰。处境困难、条件差，但大家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我们的学生，尽力教育好每一个学生。这届特殊时期招收的学生，经过四年的中学学习，还是取得不小的进步，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2）在74届年级中有一批很优秀的教师，面对不太正常的教育秩序和教学环境，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作种种探索和实践。外语组的刘光坤老师在教研组和田丽云老师（班主任）的支持下，在（1）班，结合外语课的教学，把课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改编成英语版的活报剧，利用课内外时间约请同学排练（实际上班内大多数同学都关心参加），在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气氛不浓的七十年代初，能有这样的尝试是多么的勇敢！要花多大的代价啊！经过反复动员、辅导，这些学生竟奇迹般地排演出来，在校内彩排和正式演出时引起全校轰动，好评如潮，在全区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光坤等老师这种热爱教育事业和勇于探索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位育中学教师集体是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相互间是真诚相处，携手共进的，同事间都有深厚的情谊，几十年来大家友好交往，格外亲切、真挚，我一直怀念这个令人难忘的集体！但愿位育中学的好传统“代代相传、绵绵不断”！